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量化评价研究

孟凡臣 蒋 帆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随着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不断增加, 投资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 如何评价对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是我国企业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从政治风险量化评价的视角出发, 总结了政治风险量化评价研究的现状, 提出了包含征用与限制风险、资本转移风险和政治暴力风险的政治风险评价维度; 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际, 引入“对华限制”指标和“对华负面情绪”指标, 构建了基于“中国因素”的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评价模型; 建立了以熵值赋权法为核心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 并运用模型和方法对146个国家在2009~2011年的政治风险进行了实证评价。结果表明, 本文提出的政治风险评价模型与方法契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政治风险; 评价模型; 熵值法

中图分类号: F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894 (2014) 05-0087-10

近年来, 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从中国对外投资的区域流向来看, 投资存量的70%分布在亚洲地区, 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存量占89%, 发达国家占11%, 其中在非洲、拉美、西亚等传统高政治风险地区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①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统计, 中国2005~2012年OFDI主要产业为能源和金属, 分别占总量的46%和23%。随着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增加, 投资安全问题已经不可忽视, 特别是资源领域的投资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已成为影响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

一、政治风险量化评价研究现状与问题

关于政治风险的含义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 Root (1968) 从不确定性角度把政治风险定义为在本国或国外能够引起国际商业运作的利润潜力和 (或) 资产损失的、任何类型的政治事件的发生可能性。Robock (1971)、Kobrin (1982)、Lensik等 (2000) 则从政治风险的表现特征、成因或政治与经济活动的关系等角度对政治风险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阐释。综合国内外学者的不同观点, 并结合我国对外

收稿日期: 2013-09-2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国企业跨文化吸收能力与国际并购绩效研究” (项目编号: 71272060)。

作者简介: 孟凡臣, 男, 博士,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跨国经营与战略、产业经济与政策等; 蒋帆, 男, 硕士,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研究生, 研究方向: 跨文化管理、跨国投资风险。

① 数据来源: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投资的实际, 本文认为, 政治风险应是由于各类政治行为或政治、社会事件所导致的企业海外投资的经营权益受到负面影响的可能性。

政治风险的防范在于如何进行政治风险的评价与识别, 政治风险的量化评价由于能够为政府和投资者提供较为全面而直观的参考和咨询信息, 并能为国际信用保险设计提供直接的量化风险数据支持而受到学术界的注意 (Howell, 2001)。国际上的一些评级机构建立了不同的评价体系, 其中美国政治风险服务集团 (PRS) 建立的国家风险评价方法、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 (BERI) 为评价政治风险所建立的“经营环境指数因素体系”应用较为广泛, 但这两类评价体系中政治风险的构成维度未能被清晰地划分 (Bouchet, 2003)。Ferrari和Rolfini (2008) 的政治风险评价模型将政治风险分为征用风险、转移风险和政治暴力风险3个主要类别, 并建立了指标体系, 弥补了两大评级机构评价方法的缺陷。国内学者姚凯和张萍 (2012) 结合中国的对外投资风险特点, 将“地缘政治”和“中国威胁论”作为影响因子加入模型。陈菲琼和钟芳芳 (2012) 通过对政治风险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 认为政治风险来源于东道国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和社会文化3个层面, 并据此分解出8个因素的指标体系。

上述评价体系和方法用于评价我国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 评价指标体系中缺乏源于“中国因素”的指标, 难以全面反映我国OFDI面临的政治风险特点; 其次, 主流评价方法的指标赋权采用的是专家打分法, 存在主观性过强的问题。本文在总结这些评价方法的基础上, 从我国对外投资的特点出发, 从“中国因素”方面, 采用熵值赋权法对现有的评价体系与方法进行改进。

二、政治风险的构成及其特点

(一) 政治风险的构成

在跨国投资中, 政治风险表现形式和风险来源差异性较大, 不同国家或地区存在的政治风险类型侧重也是不同的 (李福胜, 2006)。罗振兴 (2012) 认为, 我国目前面临的政治风险主要是蚕食性征用风险、恐怖主义、政治性绑架和勒索、社会骚乱、动乱和内战、东道国政策的负面变化、政府违约、一些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的投资障碍等。Ferrari和Rolfini (2008) 将政治风险三维度分解能较好地对这些政治风险分类, 对本文的研究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根据中国对外投资现阶段遭遇的主要风险状况, 我们可将其划分为征用及限制风险、资本转移风险和政治暴力风险3类子风险。

1. 征用及限制风险 (Expropriation and Restriction Risk) 是指东道国政府通过政策手段或者违约方式剥夺或者损害外商投资的所有权或经营权益, 从而导致投资损失的风险。20世纪70年代后,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全球经济政治秩序

的变化,征用及限制风险表现更加隐蔽和多样化(张英达和葛顺奇,2011)。当前更多的国家采取的是蚕食性征用方式,即采取间接的方式将外国投资者的所有权收归国有,或对外国投资者的控制权和经营权不断加大限制力度,间接达到征用的目的(罗振兴,2012)。征用及限制风险主要与一国的法制化程度、产权保护强度、政府干预经济的强弱和政府清廉程度有关。

2. 资本转移风险(Capital Transfer Risk) 是指政府由于国际收支发生危机,对于外商的投资本金、利息、利润和许可费等无法提供兑换或者限制转移回母国以及增加转移成本等风险。造成资本转移风险的一般是一国的货币政策发生改变,与政府政策相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影响资本转移的主要与一国的经济监管强度、货币政策、金融和投资领域的开放度有关。

3. 政治暴力风险(Political Violence Risk) 是来自东道国内部或外部各种因素引发的暴力斗争或者骚乱导致投资企业的有形财产和人员人身安全遭受损害或威胁的风险。政治暴力风险的形式多样,其风险成因也非常复杂,但从直接诱因来看,政治暴力可分为内部暴力和外部暴力。内部暴力是指暴力事件的发生源自一国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其表现如内战和动乱、社会秩序及犯罪、恐怖袭击和针对外资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等;直接源自外部的暴力风险,如国际冲突与争端等可视为外部暴力。

(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特点

1. 对华歧视性限制频现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企业要承受更大、更多的政治风险,近年来针对中国投资的歧视性限制更加明显。由于制度差异、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差异的存在以及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国际政治斗争加剧,我国国有企业在跨国并购活动方面屡受歧视性干预。这些趋于频繁的对中国投资的特别政治干预或限制,我们可称其为对外投资过程中的“对华限制”。2005~2012年,中海油、五矿集团、华为、中航通飞等诸多中国企业都在对美国 and 澳大利亚的投资中因涉及国家安全遭受审查并被“否决”就是比较典型的带有歧视性干预色彩的“对华限制”。

2. 对华暴力风险增加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政治暴力风险趋于频繁,一方面是由于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连锁反应,其对政治层面的影响仍在继续发酵;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造成的经济民族主义,由此带来的一些工人运动、游行示威等反跨国公司的社会活动,而一些东道国政府也并未充当积极的协调者角色。由于部分国家国民对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不认同,或者由于商业竞争矛盾,或者是历史和政治因素等,形成了对中国的敌对或厌恶情绪,我们可将其称为“对华负面情绪”。在经济民族主义浪潮下,“对华负面情绪”充当了暴力风险产生的催化剂,加剧了风险的发生。

三、评价指标模型及评价方法

(一) 政治风险评价指标模型构建

根据我们对政治风险的维度划分,本文评价模型按国别政治风险维度分为征用及限制风险(ERR)、资本转移风险(CTR)和政治暴力风险(PVR)。

对于各个维度的影响因素的指标变量, Ferrari和Rolfini(2008)构建的指标体系在姚萍和张凯(2012)的研究中得到过检验,其中征用与限制风险和资本转移风险指标符合本文风险成因的分析,因此可以沿用。政治暴力风险则引入了全球和平指数(GPI), 其将暴力风险分为“内部暴力”与“外部暴力”符合本文的分析,具体指标及其来源见表1。

表1 国别政治风险评价指标及来源^①

准则层	指标层	数据来源	指标方向
征用及限制风险 (ERR)	法治(RL)	全球治理指标 WGI	值越高、风险越低
	产权(PR)	经济自由度指数 HER	值越高、风险越低
	政府干预(GI)	全球治理指标 WGI	值越高、风险越低
	防治腐败(CC)	全球治理指标 WGI	值越高、风险越低
资本转移风险 (CTR)	监管质量(RQ)	全球治理指标 WGI	值越高、风险越低
	货币政策(MP)	经济自由度指数 HER	值越高、风险越低
	投资自由(INV)	经济自由度指数 HER	值越高、风险越低
	金融自由(FIN)	经济自由度指数 HER	值越高、风险越低
政治暴力风险 (PVR)	内部暴力(IV)	全球和平指数 GPI	值越高、风险越高
	外部暴力(EV)	全球和平指数 GPI	值越高、风险越高

除上述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别政治风险指标外,基于上文对政治风险所呈现的新趋势分析,我们认为,现阶段带有较为明显的针对中国OFDI的政治风险有特殊影响因素主要是:征用及限制风险中的“对华限制”(Restrictions to China, RC)以及政治暴力风险中的“对华负面情绪”(Aversion to China, AC)。这两项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政治风险发生的可能,因此我们加入这两个“中国因素”构建出新的评价指标体系,见图1。

对华限制(RC)往往体现在对华投资的严厉审查、质疑或议会否决,这样的特别措施往往也体现了东道国对中国投资的不信任并设法加以限制,所以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对中国投资项目进行“否决”的情况入手,建立对华限制指标。

传统基金会自2005年起详细记录了中国OFDI的失败交易的详细清单和交易宗

^① 指标来源说明: WGI即世界银行研究所的全球治理指标(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 简称WGI); HER即华尔街日报社和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 HER)发布的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简称HER); GPI即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IEP)发布的全球和平指数(Global Peace Index, 简称GP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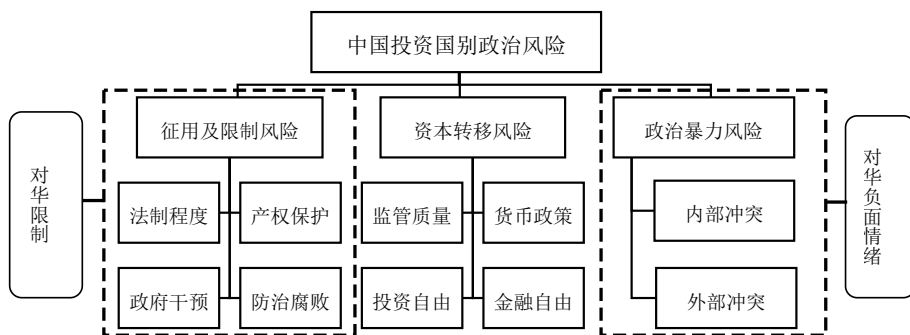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中国因素的评价指标体系

数。基于指标构建的思路，我们可以根据2005~2012年的中国对外投资失败交易情况计算出各国对华限制因素的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RC_i = 1 - (Trb_i - Trb_{globe}) \quad (1)$$

其中， Trb_i 为中国对*i*国投资失败宗数占在*i*国总交易宗数比， Trb_{globe} 为中国在全球投资失败宗数占在全球总交易宗数比。^①

对华负面情绪（AC）来自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全球态度项目连续多年发布的他国国民对中国的好感/反感的态度调查结果。全球态度项目得到各个研究机构的公认，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各国居民对他国居民的情感态度，这项调查结果在一定意义上与负面情绪有很强的相关性，我们可以由此衍生出对华负面情绪指数。

对华友好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改善中国投资者在一国的政治暴力风险，而对华负面情绪则会加剧暴力风险发生的可能。因此我们可以利用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对中国的好感度调查结果，将平均每100人中对持有好感的受访者数简称“对华好感数”（Favorable View Number, FVN），推导出对华好感度（Favorable View Index, FVI），再计算出*i*国对华负面情绪指数（ AC_i ）：^②

$$FVI_i = (FVN_i - \overline{FVN_i}) / \sigma FVN \quad (2)$$

$$AC_i = \begin{cases} 1, & FVI_i < 0 \\ 1 - FVI_i, & FVI_i \geq 0 \end{cases} \quad (3)$$

（二）模型评价操作方法

基于本文构架的评价指标模型，整个评价工作可以细分为以下5个操作步骤，见图2。

① 由于统计资料存在的问题，笔者做了如下操作：（1）中国对部分国家投资只有1宗交易且失败的，以保守估计的做法使用除此情况外最高的失败率做代替。（2）部分国家没有投资交易记录的，使用全球平均问题交易率替代。

② 在计算“厌华情绪”（AC）指标时，由于部分国家调查数据存在缺失，做了相应的处理：（1）调查未覆盖到的国家按照地区平均值赋值，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西欧、东欧、北非、西非、中非、东非、南非、北美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大洋洲国家；（2）2011年缺失数据的调查覆盖国家用最近一年的有效调查结果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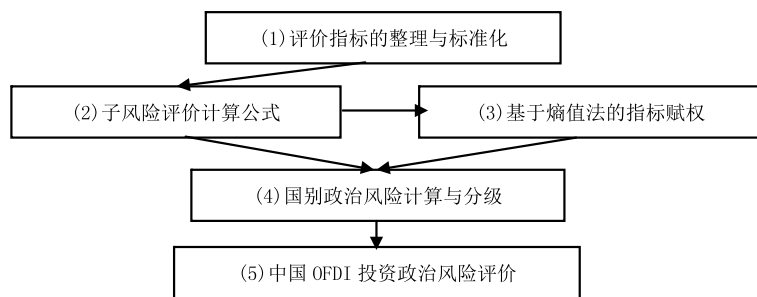


图2 模型评价操作流程

(1)评价指标的整理与标准化。首先需要对评价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并且基于“风险越高、评价得分越低”的原则对指标进行同向化处理。标准化方法运用广泛,本文使用极值处理法进行标准化,具体公式可见其他文献,此处不再赘述。

(2)评价计算公式。由于CC和AC都是归一化的指数,且与评价目标同向,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乘数。因此,修正后的3类风险评价公式如下:

$$EER_{ij} = RC_i \cdot (a_{1j} \cdot RL_{ij} + a_{2j} \cdot PR_{ij} + a_{3j} \cdot GI_{ij} + a_{4j} \cdot CC_{ij}) \cdot 100 \quad (4)$$

$$CTR_{ij} = (b_{1j} \cdot RQ_{ij} + b_{2j} \cdot MP_{ij} + b_{3j} \cdot INV_{ij} + b_{4j} \cdot FIN_{ij}) \cdot 100 \quad (\text{修改}) \quad (5)$$

$$PVR_{ij} = AC_i \cdot (c_{1j} \cdot IV_{ij} + c_{2j} \cdot EV_{ij}) \cdot 100 \quad (6)$$

其中, a_i 、 b_i 、 c_i 为各项指标的权重。

(3)基于熵值法的指标赋权。本文选用的赋权法为熵值法,首先其能克服主观赋权法的种种缺陷,也避免了由于政治风险构成复杂性所带来的主观评价困难,而熵值法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精确度。其次,熵值法原理符合国别政治风险评价的特点,全球政治风险类型具有国家间的聚类性,熵值法能很好地将聚类强的因素突出。熵值赋权法的操作方法可以参考其他文献,本文不再赘述。由于样本数据来自不同年份,最后可形成各类子风险的各年份的指标权重集:

$$A = \{a_1, a_2, a_3, a_4\}, B = \{b_1, b_2, b_3, b_4\}, C = \{c_1, c_2\}$$

(4)国别政治风险计算。国别政治风险的最终评价价值需要综合3类的风险,而这3类子风险的危害性是难以比较的,因此我们对他们之间做等权重处理,最终的国别政治风险评价公式如下:

$$PR_{ij} = (EER_{ij} + CTR_{ij} + PVR_{ij}) / 3 \quad (\text{修改}) \quad (7)$$

根据评分结果,可按照国际惯用的风险9级评级进行分级,见表2。

表2 政治风险评价得分与分级对照表

评级	AAA	AA	A	BBB	BB	B	CCC	CC	C
得分	88.8-99.9	77.7-88.8	66.6-77.7	55.5-66.6	44.4-55.5	33.3-44.4	22.2-33.3	11.1-22.2	0-11.1

(5)中国OFDI政治风险评价。根据中国在各国的投资存量(Stock),计算中国的OFDI风险总体水平(OFDIPR),同理也可计算3项子类风险的水平。中国OFDI第j

年的政治风险水平计算公式:

$$OFDIPR_j = \sum_{i=1}^m (Stock_{ij} \cdot PR_{ij}) / \sum_{i=1}^m Stock_{ij} \quad (8)$$

四、评价指标模型运用

(一) 国别政治风险评价

按照本文提出的评价步骤和计算公式,我们选取了2009~2011年共146个国家的WGI、HER和GPI无缺损数据,以及本文构建的146个国家的对华限制指数和对华负面情绪指数,进行国别政治风险的量化评价。

1. 评价计算结果 首先,经过对各项指标进行规范化处理后,我们可以通过熵值法计算出权重集:

2009年: $A=\{0.2992, 0.3124, 0.1889, 0.1994\}$, $B=\{0.2477, 0.0504, 0.4727, 0.2292\}$, $C=\{0.777, 0.223\}$

2010年: $A=\{0.3274, 0.2568, 0.1912, 0.2246\}$, $B=\{0.2612, 0.0557, 0.4277, 0.2554\}$, $C=\{0.7622, 0.2378\}$

2011年: $A=\{0.3199, 0.2662, 0.1843, 0.2296\}$, $B=\{0.2604, 0.059, 0.4194, 0.2612\}$, $C=\{0.7734, 0.2266\}$

3年中政治暴力风险中的内部暴力(IV)和外部暴力(EV)所占权重分别保持在77%和23%左右,说明影响一国政治暴力风险的主要因素来自于国内,这一点与许多研究的结论是相符的。将权数代入计算公式后,我们可以对选取的全部样本国家2009~2011年的政治风险进行量化评分,最后得到146个国家的3年政治风险评分,并对其进行评级。最后的政治风险评价分级情况如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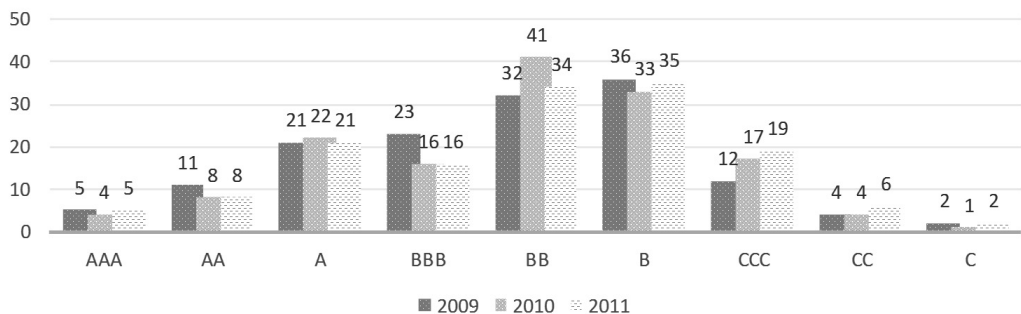


图3 2009~2011年中国对外投资国别政治风险分级总体情况

其中,2011年评级为CCC的国家有菲律宾、叙利亚、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尼泊尔、塔吉克斯坦、布隆迪、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刚果(布)、海地、也门、尼日利亚、俄罗斯、中非、乍得、厄立特里亚;评级为CC的国家有伊朗、委内瑞拉、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利比亚、刚果(金);评级为C的国家有津巴布韦和朝鲜,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主要分布在非洲、中东及朝鲜半岛。

2. 评价结果检验 根据国别政治风险的评价结果,我们可以对2009~2011年期间发生重要政治动荡和变革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检验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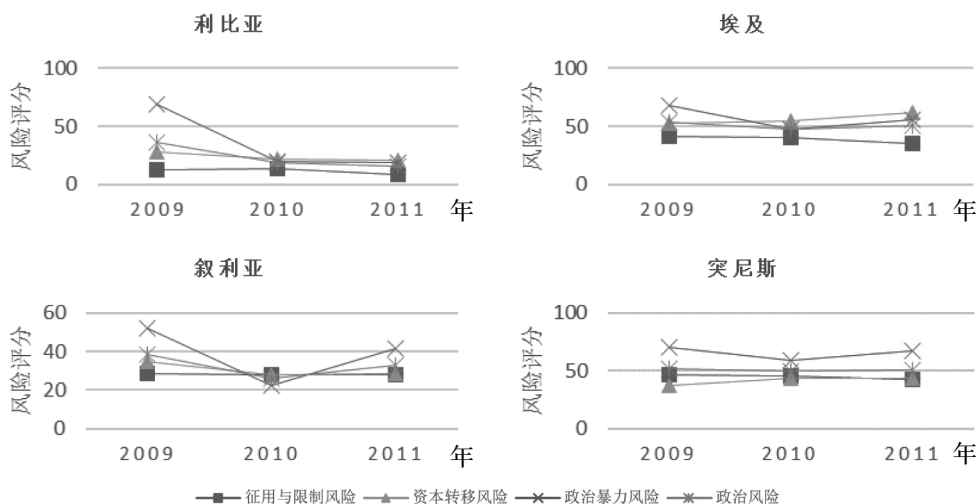


图4 2009~2011年北非及西亚4国政治风险评价走势

首先, 我们可对2010年和2011年北非和西亚政治剧变的国家进行分析, 选取利比亚、埃及、叙利亚和突尼斯4国3年的评价数据, 见图4。可以发现, 在2010年, 4个国家政治风险综合评分都有所下降, 其中政治暴力风险评分都有明显的下降。事实上2011年初, 这4个国家都发生了不同规模的政治动乱和革命。由于反映政治暴力风险的GPI指数为每年年初发布当年评分, 能发现评价结果还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叙利亚到2013年国内动乱仍在持续和激化, 得分却在2011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回升, 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叙利亚本身的评分就显著低于其他3国, 且由于政治动荡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因素, 来源指标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征用、限制风险和资本转移风险没有出现较明显的波动, 这与事实也相符。总体而言, 该评价结果总体上反映了政治风险的实际状况, 评价效果也较好。

其次, 我们可以再对朝鲜进行检验。从图5可以发现朝鲜的政治风险状况评价得分极低, 3年来一直处于C级, 且还有下降趋势。政治暴力风险评分下降最为明显, 这能反映出2009年朝鲜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和2010年年底发生延坪岛炮击事件的消极影响, 以及2011年底朝鲜前领导人去世带来的国内和国外各方政治紧张态势, 增加了在朝投资风险。征用与限制风险评分极低, 资本转移风险评分为0, 这也符合朝鲜的经济和政治实际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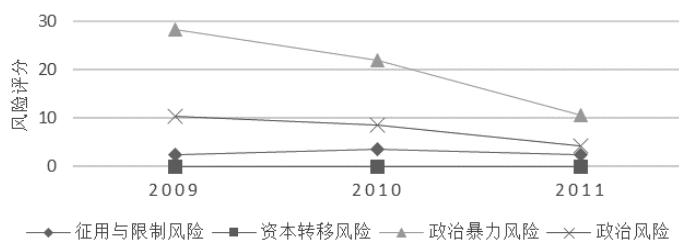


图5 2009~2011年朝鲜政治风险评价走势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评价结果

根据商务部数据，2005年前中国OFDI存量占有统计数据以来的中国OFDI存量不到10%，因此可使用美国传统基金会记录的2005~2012年中国OFDI的交易情况数据估算出在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Stock）估计值以及各个行业在不同国家的投资存量估计值。

评价结果显示，中国OFDI的总体风险评分为63.41，意味着中国OFDI所面临的总体风险为BBB级，尚处于合理范围之内，征用及限制风险、资本转移风险和政治暴力风险分别为60.33、69.4、60.49，评价结果一定程度上也符合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主要风险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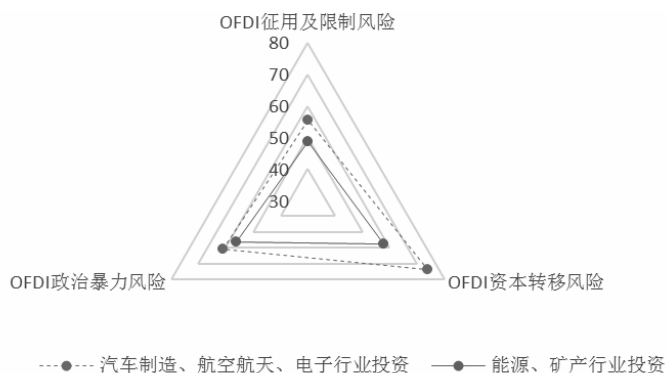


图6 2011年中国两类投资行业的政治风险状况

其次，根据传统基金会的投资项目统计计算得出不同行业的政治风险情况（见图6），可以发现以海外能源和矿产为代表的资源获取性的投资面临的危险最为严重，其OFDI政治风险评分为54.23，其遭遇到的各项风险均高于总体风险。以获取资源为目的的投资都涉及国家战略资源，并且资源丰富国多为政治不稳定地区，如非洲和中东地区，其面临的危险也较为突出。近年来发展较为迅速、以技术获取为导向的制造业，如汽车、航空航天及电子信息等行业的投资整体政治风险明显低于资源型投资，但可以发现其面临的征用及限制风险却高于其他两项风险，这也符合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有意识地对我国高技术行业进行并购限制的现状。

五、结论

通过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现状分析，构建出适用于中国OFDI的国别政治风险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并通过实证性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从评价结果来看，我国当前面临的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需要控制，资源获取性投资的政治风险较高，且需要格外注意征用及限制风险的发生。

评价体系和模型存在的不足在于：首先，其宏观性的评价对于企业具体实施

海外投资的指导性存在不足,由于不同投资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差异较大,还需要综合考虑行业和项目本身的风险因素。其次,评价指标中部分数据发布较为滞后(如WGI),尤其还有许多指标数据难以采集,对政治风险的预测造成一定影响。对政治风险评价的研究将尝试用“大数据”方法挖掘更加丰富的数据,逐步弥补这一缺陷。最后,由于政治学领域研究成果引进到投资学领域的不足,对于当前的政治风险中地缘政治和投资国因素等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Root, F. R. The Expropriation Experience of American Companies [J]. Business Horizons, 1968, (11).
- [2] Robock, S. H. Political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J].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1971, (6).
- [3] Kobrin, S. J. Managing Political Risk Assessment: Strategic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M]. Berkeley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 [4] Lensik, R., et al. Capital Flight and Political Risk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2, (19).
- [5] Howell, L. D. The Handbook of Country and Political Risk Analysis [M]. New York: East Syracuse, 2001.
- [6] Bouchet, M. H., et al. Country Risk Assessment: A Guide to Global Investment Strategy [M]. Hoboken: J. Wiley, 2003.
- [7] Ferrari, F., Rolfini, R. Investing in a Dangerous World: A New Political Risk Index [J]. SACE Group Working Paper, 2008, (5).
- [8] 姚凯, 张萍.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及量化评估模型[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2, (5).
- [9] 陈菲琼, 钟芳芳.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预警系统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1).
- [10] 李福胜. 国家风险: 分析·评估·监控[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11] 罗振兴.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及管理策略[C]. 商务部. 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1~2012), 2012.
- [12] 张英达, 葛顺奇. 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 结构、趋势与对策[J]. 国际经济合作, 2011, (11).
- [13] 张金杰. 国家风险的形成、评估及中国对策[J]. 世界政治与经济, 2008, (3).

A Study on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Risks for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ENG Fan-chen JIANG Fan

Abstract: As China's OFDI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investment security issu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how to evaluate the political risks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that Chinese enterprises currently f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risk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tatus of political risk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proposes political risk dimension which contains expropriation and restriction risk, transfer risk and political violence risk.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risks which are faced by China's OFDI,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strictions to China" indicator and the "Aversion to China" indicator, establishes a "Chinese factor" basis political risk evaluation model. This study also uses the entropy weighting method for an empirical calcul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146 countries from 2009 to 2011 and the data of China's OFDI.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valuation model and the method is more effective for the situation of China's OFDI.

Key word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olitical risk; evaluation model; entropy method

(责任编辑: 张建华)